

香港教學語言的鬼魅：語言作為身份政治與文化霸權爭奪的戰場
文己翎
(研討會初稿)

引言

「十多年前，他們來這裡還要學廣東話。」

「我警告你，兒子要升中學，你不要再跟他說廣東話。」

這是近期香港電影《十年》裡故事<方言>的對白，故事講述十年後的香港，政府政策規定從事旅遊相關行業人士需要通過普通話檢定資格，香港官方語言近乎全面使用普通話。飾演計程車司機的主角，不諳普通話，不但難以維生，連當父親的資格也受到挑戰。說廣東話被排斥，香港變得令土生土長的人們無法適應。

「兩文三語」(中文、英文書寫，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口語)是香港政府一直以來的語言政策目標。官方想像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國際大都會，香港市民需要學好英文和普通話。然而，不同語言的使用，卻從來不是自由多元的進步想像，反而是成為了文化霸權爭奪的戰場。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1 年人口普查的資料，以廣東話作為慣用語言的人口比例佔全港的百分之九十，以普通話作為慣用語言的人口比例不足百分之二。為什麼社會上會出現憂慮廣東話被普通話取代的恐慌？本文嘗試梳理殖民時期到近年的教學語言政策，探討語言中的政治，如何成為文化霸權爭奪的戰場；教學語言中的政治性，教學語言如何作為階級想像與族群想像。

文獻綜述

過往研究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多是以教育為目標，以教學法的理論，研究各項教學語言政策的成效，或是將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置放於香港教育制度發展的脈絡中討論。戰後香港的教育制度發展，走向了普及化、現代化，在 70 年代普及小學教育、80 年代普及初中教育，高等教育也在擴展。然而，以現代化概念思考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容易忽略教學語言中的政治性，大部分時候，教學語言政策的轉變，教學質量都不是推行政策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學者研究教學語言與國族建構的關連。在香港，普通話常常作為廣東話的「他者」，透過廣東話來建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或是以「混雜」，強調中文與英文的混合使用，這種「混雜」的文化匯合是香港人身份的特色。這一研究進路雖然注意到教學語言中的政治性，但也忽略了教學語言與國族建構、殖民經驗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

黃庭康在《比較霸權》一書，嘗試借用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分析華文學校在戰後香港與新加坡對國家權力形構產生的重要影響。霸權是通過對被統治者文化吸納改造而建立的宰制關係。葛蘭西認為，「霸權階級」是市民社會中能夠透過意識形態鬥爭將「政治領導」與「道德及知識領導」結合起來的一股勢力。當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更為微妙複雜，兩者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往往建基於「文化吸納政治」。文化吸納的概念與殖民主義的研究更是關連，殖民統治者在打造殖民權力時一般不會完全將被殖民者的文化排除，反而是吸納當地原有的制度與

權威來確立其主導地位。¹ 羅永生也同樣借用文化吸納的概念來研究香港的殖民經驗。羅永生認為，探討香港的殖民經驗，不可將國族主義與殖民主義對立看待。相反，英國殖民統治者透過建構「中華性」，使其更便利於殖民管治。香港的中華性與殖民歷史不是二元對立，而是相互交錯。²

國家權力的形構，不只是統治者上而下的政策主導。黃庭康加入社會運動作為國家霸權形構的變項，肯定國家霸權與社會運動之間的互動關係。社會運動打造的身份認同、提出對抗原則、要求國家落實改革，使得國家霸權策略受民間動員影響。³ 不過，國家權力的形構，不只是上而下的政策主導，或是民間動員下而上的影響，更是不同力量角力下產生的結果。二戰後的香港，國家權力形構，除了殖民政府上而下的統治、社會衝突對殖民政府霸權策略的影響以外，也不能忽略當時北京與台灣兩個敵對政權在香港動員的影響。正是國家權力形構是多種力量複雜的角力，殖民者的文化霸權策略也不可能是完全牢固，反而各種政策經常出現沒有預期的結果。

本文嘗試透過霸權策略的概念，研究殖民時期到現今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嘗試剖析教學語言中呈現的政治。不同的政治力量如何在教學語言的場域，相互爭奪文化霸權的位置。不同的論述之間的角力，使文化霸權並不是完全牢固，而是個不斷重新建構的過程。研究各種論述爭奪文化霸權的過程，本文亦嘗試透過教學語言論述從階級想像到族群政治的變化，思考香港政治的不同的可能。

殖民早期的菁英教育

在殖民管治早期，殖民政府已經嘗試透過英語教育，培養少數華人菁英。官方論述認為，把官方主要語言定為英語，除了是殖民管治的需要外，官方更強調英語的實用價值，以功能主義出發，認為英語的主宰地位源自於其商業價值。首任教育署署長於 1914 年英帝國教育會議中提及：「我們在香港開設英文中學，並不是道德責任問題，而是商業發展需要。」⁴ 不過，羅永生指出，英語的特權位置從來不是僅由商業造成的結果。英語促成的階層分化的作用遠遠大於促進文化交流以至融合的作用。這使得香港內部出現一個「他者」，能操流利英語的華人菁英與逃難來港的新移民階層。英語一直在香港佔據了主導性的官方地位，但卻從未成為日常生活中的大眾通用語言。不只是在港的歐裔人士想要種族區隔，本地華人菁英同樣希望實現社會階級的隔離。富裕華人為自己的子女配備了一項文化資本，加劇了他們與貧窮華人之間的不平等。

殖民早期的中文教育

¹ 黃庭康，《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台北：群學出版社，2008，頁 27

² 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頁 4-5

³ 同註 1，頁 33

⁴ 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局，1997，頁 441

早於 1935 年，賓尼報告書(Burney Report)提到，母語教學是一種較好的教育安排，應該要推廣。而殖民政府並不想壓抑中文教學，認為中文教學也可以是很有效的殖民統治媒介。Pennycook 指出，殖民政府鼓勵中文教學，尤期強調服從上位者的簡化了的儒家思想，更有效殖民政府的管治。⁵ 不過，在二戰前，雖然殖民政府並不壓抑中文教學，但也不積極推廣。1938 年，在政府自辦的二十所學校中，只有一所是中文中學(即戰後的金文泰中學)，政府給予中文學校的補助津貼，喝佔政府公共教育開支總支出 5-6%⁶，對中文教學的方針採取「放任自由」的教育政策。直到二戰結束，冷戰的全球格局、加上國共內戰對香港產生的政治變化，才使殖民政府改變原有的教育策略，開始主導香港中文學校體制的發展。

冷戰格局下的霸權爭奪

早在四十年代中期，共產黨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到許多新界地區的學校，他們招募學生加入中國共產黨、訓練並持續供應在中國進行反國民黨鬥爭所需的人力。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建國後不久，香港更是成為了延續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大敵對陣形衝突與爭奪的戰場。被外間稱之為「小台灣」的調景嶺，是國民黨在香港的根據地。為了拉攏香港年輕人，兩個相互敵視的中國政權在殖民地教育圈積極進行統戰，提倡兩套不同的「中國」論述。⁷ 與台灣國民黨政府關係密切的，以德明、大同為首的學校，當時組有中文私校聯會；與北京共產黨政權關係密切的，如培僑、香島，當時一度稱為「進步中學」，後改稱為「愛國中學」。⁸

殖民政府憂慮兩個「中國」政權在香港的鬥爭會威脅殖民政權對香港的管治，特別是與香港相鄰的共產黨政權，因而加強邊界將香港與中國區分開來、阻擋中共對香港的滲透、並減低共產黨政權對香港華人的影響。在五十年代初期，香港立法局制定「人口註冊法」，規定所有香港居民到「人口註冊署」登記、新移民也須在抵港七日內辦理登記手續，法案又規定人口註冊署建置居民相片和指紋資料庫、並向辦妥註冊的居民發放身份證。⁹ 雖然殖民政府並不抑制中文教學，卻對有政治色彩的學校十分敏感。刻意的中港區隔也表現在香港中文教育場域。當時，殖民政府為了在政治上抗衡親北京與親台勢力在香港擴散，改變了戰前「放任自由」的教育政策。戰後港英政府積極發展以中文教學的津貼學校。1946 年教育司署通過《津貼則例》補助 120 所中文學校；兩年後，受惠的中文學校增至 244 間。1948 年，當局修訂《津貼則例》，提昇津貼學校教師薪酬至約為公立或補助學校教師的三分之二。新的條例也授權教育署長撥款補助津貼學校的建築費用。另外，法令也讓津貼學校可以獲得經常性支出補助，金額不少於核准支出和學費收入差

⁵ 許寶強，《缺學無思：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頁 143

⁶ 同註 4，頁 449

⁷ 同註 1，頁 86

⁸ 同註 4，頁 477

⁹ 同註 1，頁 90-91

距的二分之一。¹⁰

1952年，殖民政府成立「中文學科委員會」，並出版有別於台灣於中國大陸，根據殖民政府頒佈的課綱編寫的教科書。「中文學科委員會」主張把香港的中文學科去國族化。報告書指出過往香港學校的語文、中國文學與中國歷史課程都追隨中國教育的大方向，過分渲染中國民族主義。委員會建議中文教育以白話文為主、反對教授簡體字、以偏重廣東語教學忽略普通話。黃庭康認為，長期偏重廣東話、繁體字而忽略普通話、簡體字等等，有助於強化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區隔以及穩定殖民統治。¹¹

1952年6月，教育司署舉行首屆的「中文中學會考」，嘗試推動一種以考試升學主導、「去國族化」的中文教育。「中文中學會考」制度讓中文學校學生有機會學習大量有關中國與中國文化的知識。然而，「中文中學會考」所呈現的中國文化是一項經過改造的「選擇性傳統」，它的作用是阻止香港出現強烈的親北京或是親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身份認同。明顯的例子是歷史科考試的課綱只涵蓋清朝初期到1945年抗日戰爭這段時間，而省略了往後國共內戰與新中國成立的事件。¹²

教育司署成立「中文中學會考」後，課程改革被親台灣與親北京的左派學校抵制。1952年2月，九名左派老師在立場親北京的《文匯報》發表文章批評中國語文科考試包含太多古文且排除當代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認為新的考試是殖民政府試圖箝制年輕人的工具。親台陣營也同樣抵制殖民政府的去國族化策略。他們依從國民黨頒佈的課程、採用台灣教育部編寫的教科書授課。¹³ 殖民政府的教學論述面臨親台與親北京兩大陣營的國族主義論述挑戰。在五十年代初，殖民政府的去國族化策略未能奪得文化霸權位置，原因在於，當時香港只有香港大學一所大學為殖民政府承認並頒授大學文憑，而港大幾乎只取錄英文中學的學生。欠缺優質升學途徑的中文中學學生，遂湧向中國大陸或台灣升學。中共與國民政府亦明白大學的戰略重要，遂大力資助大學，吸引大量香港學生離港升學。對當時的中文中學學生來說，北上升學，大學以中文為教學語言，同聲同氣；中國大陸的大學有政府資助，學費遠低於港大；加上國內大學能提供和中國文化有關課程。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也拉攏香港的龐大學生群體。50年代初開始台灣就特別預留一些學位給予香港學生，而數量也穩定增加，甚至直接在香港舉辦聯合考試招募學生入讀大學。¹⁴ 50年代初，香港的高等教育，成為了殖民政府與兩岸

¹⁰ 黃庭康，〈無心插柳的霸權效應：戰後香港中文學校的組織吸納〉，《思想香港》，第6期，2015年3月，(<http://www.thinkinghk.org/#!v601-/c1bpk>)

¹¹ 同註1，頁177

¹² 同註1，頁183

¹³ 同註1，頁183-184

¹⁴ 王邦華，〈含糊曖昧的中大理念、朝三暮四的大學體制〉，《中大五十年》，香港：中大五十年編輯委員會，2015，頁14-15

國共政府文化霸權爭奪的戰場。

殖民政府擔心，香港本地學生被兩岸政府大量拉攏離港讀書，會大大增加殖民管治困難。殖民政府一直擔心香港會出現強烈親台灣或是親北京的國族主義意識。一方面，殖民政府不希望香港社會熱烈擁護新中國的共產革命，擔心反殖思想會影響殖民統治。另一方面，殖民政府也不希望香港成為國民黨的反共基地。殖民政府也擔心，香港成為反共基地，可能刺激中共反彈，以武力奪回香港。因此政府當時努力維持一個政治平衡，既要避免本地市民被中共吸引過去，又要避免國民黨勢力介入香港社會。殖民政府在冷戰時期的管治大方針嘗試保持「中立」，當時的總督葛量洪指出，殖民政府能夠保持他們在香港的管治，在於對各種政治議題的不介入。這需要在各種政治議題上，嚴格地保持合法性和公正性。（“The strength of our position in Hong Kong depends largely upon non-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issues. This can be achieved only by maintaining strictly legality and impartiality in any issues with a political tinge.”）¹⁵ 假如任由中文中學的學生的外流，學生被國共兩大陣營吸納，便對殖民政府形成間接的政治威脅，使殖民政府嘗試經營的「中立」環境出現危機。因此，當時政府需要建立另一間大學。這間大學需要有足夠吸引力去吸納本地的中文中學學生，而政治立場不能偏向國共任何一邊，用以幫助香港社會保持意識形態中立。

在這情況下，崇基、聯合和新亞三書院在 1957 年提出擴充中文高等教育的要求，正好切合政府的戰略考慮。三間書院當時已經頗具名聲和規模，課程質素有所保證。崇基於 1951 年由南逃至香港的十三間基督教大學合併而成，創校時頗有基督精神與中國文化並重的傾向。聯合由五所從廣州南遷來港的地方院校組成。新亞由錢穆和唐君毅等幾位為了逃避共產黨統治而遠走香港的學者創辦。他們認為大陸全境已陷入共產黨之手、中華民國只能孤懸台灣的情況下，中國文化已經陷入「花果飄零」的危機。¹⁶ 這些由中國大陸逃難遷來香港的院校，正好合乎殖民政府要建立政治立場不能偏向國共任何一邊的原則。1963 年，政府提議以崇基、聯合和新亞三所書院為基礎成立一所聯邦制的中文大學。中文大學的成立更是發揮了鞏固殖民管治的霸權功能，提高了「中文中學會考」的重要性。1964 年 12 月，中文大學宣佈參加 1965 年度中大入學考試的考生必須完成六年中學教育並通過中文或英文中學會考。這迫使本地許多中文中學依從殖民政府的官方課程進行教學。¹⁷

值得注意的是，二戰後，國共兩大陣營與殖民政權也嘗試爭奪文化霸權位置，香港中文中學與高等教育的場域，成為各方力量角力的戰場。殖民政府能夠奪取霸

¹⁵ 同註 14

¹⁶ 同註 14，頁 15-16

¹⁷ 同註 1，頁 196

權位置，不只是上而下的政策成效。殖民政府的教育策略能夠有效運作也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對殖民政府挑戰力度不夠激烈的結果。雖然國共兩大陣營把香港視為延續國共內戰的戰場，但兩大敵對陣營都視對方為「他者」，而非港英殖民政府。國共兩黨都無法在香港發動強大的反殖運動。國民黨在香港的活動需要英國政府的默許，他們避免與港英政府發生衝突。中共則表明不會收回香港，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對港英殖民政府採取容忍的態度。殖民政府發現，國共兩黨在香港的活動，都難以有力影響殖民政府的統治。黃庭康研究戰後香港的中文中學系統，更是形容殖民政府的收編是無心插柳的霸權效應。¹⁸

然而，殖民政府的文化霸權大計，也不必然完全牢固，中文大學也從殖民政府的文化霸權大計漸漸變成反殖意識的想像空間。中文大學很多人事和制度的爭論，如大學年制、授課語言、書院架構等，都成為大學文化政治角力的場域。60年代末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在1968年1月20至21日崇基學院舉辦的研討會下作為起點，中文運動底下激發民族主義意義與反殖意識，亦使中文大學成為往後「火紅年代」學生運動的先行者。雖然中文大學是殖民者文化霸權的重要一環，但各名創校者反共的飄泊中華認同，其後中文大學在各項社會運動中的位置，漸漸使中大成為了理想主義與反殖意識發展的空間。殖民者的文化霸權策略，在社會各種力量複雜的角力下，中文大學的例子正是展現了殖民者與戰後中文教育發展既是共謀又是敵對的曖昧關係。

二戰後中文教育的發展，不管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個敵對政權透過成立中文中學在香港宣揚兩套不同的國族論述、民間社會發起「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中文」都帶有濃厚的國族主義意識與反殖色彩。殖民政府為了降低國共兩個政權在香港的影響力，刻意吸納本地的中文教育，打造「中立」、重視「實用性」的中文教學系統。強調「實用」，特別是語言的商業價值，在70年代中後期續漸成為香港主流的語言論述。這強調經濟、非政治性的論述，卻其實帶有強烈的政治目的與戰略考慮。

普及教育下教學語言的實用主義

70年代中期，香港還存在童工，面對來自歐洲的國際壓力，香港的童工現象使當時的英國政府十分尷尬。1978年新學年，殖民政府施行九年強迫免費教育(6年小學、3年初中)，把童工變成學生。當時，殖民政府想在初中延續小學的中文教育，但在家長和學校的強烈反對下，沒有通過。在70年代後期，港督麥理浩的施行包括房屋、教育等各項社會福利改革後，香港社會續漸走向繁榮，教育越來越走向功能主義的想像，認為教育能使子女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本地家長和

¹⁸ 黃庭康指出，二戰後殖民政府積極發展中文中學，但並沒有完全收編私立的中文學校。這造成官立、津貼、私立學校之間的分化，使中文中學無法整合成為對抗殖民政府的陣線。然而，黃認為分化政治並非殖民政府的政策意圖，卻形成了非意圖下的霸權效果。

學校都認為，英語教學有實用的考慮，學生進入英語教學的學校環境，能增加學生的文化資本，提供更多升學及就業的機會，透過考試制度，成為新進的「文化菁英」。

殖民政府一直以來透過菁英教育，培育少數能操流利英語的華人菁英，一方面分化本地華人，一方面以少數華人作為與華人社會溝通的橋樑。全面在各中、小學校推行英語教學，顯然不是殖民政府一貫的教育政策方向。然而，在 80 年代中期，進入中英談判階段，政治前境的不明朗使得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搖擺不定，雖然有意推行中文教育，財政增撥卻有很多考慮，結果在政策施行上採取「放任自由」的教學語言政策，容許學校自行選擇用中文或是英語作為教學語言。這「市場化」的教學語言選擇，結果從 1985 至 1988 年間，中文學校佔全港學校總數的比例一直減少。¹⁹

功能主義的教學論述直到 80 年代初才主導香港的教育發展。這套論述並非殖民政府完全上而下推行的教育政策。反相，是透過家長對於英語作為文化資本的想像、學校因為「市場化」與競爭壓力下，改用英語教學，這套論述才得以鞏固。中文中學開始漸漸衰落，中文中學與英文中學的分野越來越強烈，中文中學亦成為了「次等學校」的象徵。

九七後母語教學政策

在主權移交後兩個月，特區政府推行「母語教學」政策，規定除了獲得豁免的 114 間英文中學以外，強制全港所有中學必須在新學年，以廣東話作為教學語言。正如上述所言，「母語教學」政策並非回歸後的新政策，一直而來，殖民政府都不壓抑中文教育。上述所言，在 80 年代，殖民政府亦曾嘗試積極鼓勵學校推動中文教學。然而，在 1984 年以後，中英談判的角力，使殖民政府未有全力推行中文教育，80 年代的語言教學政策處於比較含糊的狀態。主權移交後，特區政府對「母語教學」政策的強制執行卻引起學生、家長及學校的強烈反對。當時，無法成為獲得豁免的學校，家長、學生與老師一起抱頭痛哭，仿如世界末日。

一直以來，母語教學都得到教育學者支持。特區政府推行「母語教學」政策，政府誤以為會得到支持，卻造成極大的反彈。將教學語言從英文轉為中文，看似是改變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卻是諷刺地更加鞏固了英語的特殊地位。正如上述所言，殖民政府故意將英語成為一種文化資本，用作階級區隔：只懂得中文的大眾市民與操流利英語的華人菁英。特區政府推行的「母語教學」政策，只允許少數指定學校以英語授課，而所有能保持以英語授課的學校都是傳統名校，來自英文中學的學生成為一種文化身份的象徵。英語作為文化菁英的想像更是牢固，使得學生之間的競爭更為激烈，家長想盡辦法爭相把子女送往英文中學，學生都害怕

¹⁹ 同註 5，頁 145

被貼上來自中文中學的標籤。

Elaine Chan 曾經借用 Bourdieu 的語言概念，研究香港後九七的「母語教學」政策。語言、文化與教育是製造不同社會關係的中介。語言能夠作為文化資本，在於操作該語言的能力，能有助於攀升社會階級。教學語言使某種語言制度化，有別於日常生活應用的方言，並優越於其他語言。²⁰ 香港家長對於英語作為文化資本的想像，與香港城市的想像十分相似。政府官方的「香港故事」，將香港描繪成為自由開放、中西文化交融的國際城市。由於香港「國際化」城市的特質，家長普遍認為英語是國際語言，能操流利英語，有助提高子女的競爭力。「國際城市」的修辭，看似是多元、開放的城市論述，卻是忽略了本身論述的殖民性。主權移交後，英語在香港仍有較優越的位置；學習英語，仍是功能主義的想像，強調英語的實用性，特別是英語的商業價值。「開放、多元」的文化想像背後，中文與英語兩種語言卻有著不同的階級位置。然而，強調「功能性」的語言論述，不只是統治者上而下的語言教學政策，同時亦是家長、學校的共同參與。

「兩文三語」政策

自 80 年代中英談判啟動後，已預視引進普通話是無可避免的趨勢。2000 年，普通話成為中學會考的科目，重要性大大提高。2001 年，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到「兩文三語」政策：「推廣兩文三語，是我們的既定政策。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有必要普及基本英語；而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市民亦必須學好普通話，才能有效地與內地溝通交往以至開展業務。」

2002 年，教育局制定〈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回應 2001 年特首的施政報告，以「提升競爭力」、「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定位，必須推動「兩文三語」：「香港是國際都會，為提高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我們需要培養善用『兩文三語』溝通的新一代。『文』指書面語，『語』指口語。中國語文教育中的書面語包括語體和文言，口語包括粵語和普通話。在中國語文教育中，這些都需要均衡兼顧。」到了 2003 年，差不多所有小學都有普通話課程，九成中學有普通話課程。

政府推行「兩文三語」的政策，與殖民時期的英語政策一樣，同樣是一種菁英的想像，懂得三文兩語的學生擁更多的文化資本，更有競爭力，方便與中國大陸經商交流。「兩文三語」的文化菁英想像，甚至比英語作為菁英用語更具優勢，更是種特殊階級的想像。正如殖民政府認為英語的主宰地位源自於其商業價值，九七後，特區政府在推廣「兩文三語」政策時，同樣重覆殖民政府的論述，反覆強調「兩文三語」的商業價值。

²⁰ Elaine Chan, *Beyond Pedagogy: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23, No. 2 (Jun., 2002), pp.271-285

「兩文三語」看似是承繼了香港文化「混雜」的城市特色，然而，「兩文三語」的使用卻不是多元、開放的想像，而是三種語言相互爭奪競逐的狀態。這樣的相互爭奪競逐的狀態，不只是體現在學校的教學語言政策上，更是在日常生活的應用交流上，三種語言形成了不同社群、階級的分隔。

在研究香港的教育政策時，許寶強認為，殖民政府在二十世紀初也曾強調中文教育，為的是更有效的收編與馴服殖民地的子民。不論是中文或是英語的教育，其實也都可以是殖民大計的一種表現。倘若有關語文教育的論述仍然是「英語 vs. 中文」；又或是強調「三文兩語」，而不觸及英語或中文教育本身可能帶上的殖民性質，那麼所謂的語文教學的爭論，恐怕只是建構殖民文化的共謀，更是排拒有關語文想像的空間。²¹

語言作為族群想像

在推行「普教中」(以普通話而非廣東話去教授中文學科)的政策上，特區政府吸取了回歸早期強硬推行「母語教學」的教訓，並沒有強制要求學校必須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在 2008 學年，政府為推行「普教中」的學校，提供資金與教師培訓等資助。在這些誘因之下，政府的資助計劃一推出的時候，就有百多間學校提出申請，供不應求。同年，大概兩成的小學已經推行「普教中」。²² 然而，社會上卻出現強烈反對「普教中」的論述。反對「普教中」的論述主要認為，「普教中」引進的簡體字是「劣質」的文字，也擔心在教學語言上以普通話取代廣東話，不單使統治者易於治理，亦同時續漸消滅香港的地方文化。

反對「普教中」的語言論述從過去語言作為功能主義的想像，近年轉變為對中國文化入侵下的自我保護的「本土主義」。語言作為族群政治，不只是在教學語言上的爭論，張力亦體現在各日常生活的場域。2012 年，將軍澳新開幕的商場 PopCorn 內的法國品牌 agnès b. Cafe，其餐牌上只有英文和簡體中文，而食物的中文名稱亦用上中國大陸的稱呼，例如把「牛油」稱為「黃油」、把「沙律」稱為「色拉」等，惹來餐廳被杯葛抗議。去年，香港的文化工作者「本土工作室」，計設了 24 款區分中國大陸與香港在文化、習慣、經濟、生活方式的差異的對比圖卡，名為「香港不是中國」。其中一款的對比圖，指出中國有的簡體字「爱」沒有「心」，不像是香港用繁體字的「愛」是有「心」的。這「愛」的繁簡體對比，不只是兩地語言文化上的差異，便是一種符號象徵，以廣東話方言的地方文化作為一種更優越、來自民間、更為開放的文化；相反，普通話與簡體字所代表的則是威權、封閉、保守、落後的「中國官方」文化。

²¹ 同註 5，頁 150

²² 同註 5，頁 153-154

社會對於普遍話、簡體字所象徵的「中國文化」的恐懼，與近年中國政府不斷直接或間接在各方面干預香港事務有關。在主權移交初期，北京對香港的事務採取「不干預政策」。直至 2003 年，特區政府強硬推行《基本法》23 條立法，引起超過五十萬市民上街遊行反對。遊行規模之大，令北京領導人非常意外，並改變主權移交以來對香港事務的方針，認為需要更加積極更入香港事務，中港關係漸漸變得緊張。在新的對港政策方針下，北京一直干預香港的政制發展，在 2004 年人大常委會否決 2007/2008 年實行雙普選、2007 年人大常委會否決 2012 年實行雙普選、2014 年人大常委會決定「8.31 特首普選框架」。北京多次強硬地干預香港事務令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亦對北京政府的觀感越來越差。雨傘運動的出現，是香港市民對民主制度的渴望；同時亦是對北京政府一直強硬介入香港政制事務的敵視與反抗。

北京政府不只在政制發展上積極干預香港事務。2003 年開始，北京政府推行「個人遊」計劃，開放數個內地城市，方便當地居民來港旅遊。2009 年，北京政府又推出「一簽多行」政策，「自由行」政策實行後，香港經濟漸漸依賴中國大陸遊客，改變原先旅遊業與零售業的產業結構。然而，在當代香港，財富和時間、空間、知識等資源兩極分化，在面對中國大陸龐大的資金和政治力量南下時，佔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和缺乏資源的社群，往往首當其衝，在經濟、政治以至日常生活上都感受壓迫。統治階級並不嘗試解決資源分配與階級分化等問題，更是努力在中國大陸龐大資金南下時，努力「融合」、「共謀」，籍機會分一杯羹，搭上中國資本主義的列車，任由社會上的族群矛盾加劇。例如，商場街舖配合中國大陸旅客消費模式的改變、新建的私人樓宇變成投資炒賣的市場、公共交通如高鐵的設計配合中國鐵路的高速發展、醫療和教育資源的分配的不平等。政治、經濟資源由少數人所主導，使少數人口佔用了愈來愈多的土地、商品、知識，擠掉本地大多數人的生活空間和選擇。²³ 原本香港的階級分化、資源分配兩極化的問題，在「中國因素」氣旋擴大的社會氣氛下，更是容易將原本本地的階級問題轉化為抗拒中國入侵的強烈情感。

雨傘運動以失敗告終，北京政府加強對香港的控制，更是激發一種以中國作為他者的「本土主義」。過往香港的政治力量分成建制派與泛民主派兩大陣營，泛民主派以爭取「真普選」的議會民主制度作為統合社會各種紛雜的訴求。在後雨傘運動的香港社會，「真普選」遙遙無期，爭取議會民主的政治訴求無法串連整個反對運動。反對運動的分裂，不同政治立場的「本土」浪潮興起。雖然各種政治力量都在後雨傘運動的社會中爭奪反對運動的領導位置，卻並未有新政治力量能重新組合整個反對運動。無力改變香港政治的現實環境，使懼怕中國入侵的情感反映在日常生活的各種文化場域上。電影《十年》，劇中想像十年後的香港變得令土生土長的人們無法適應：計程車司機不諳普通話，不但難以維生，連當父親

²³ 許寶強，〈香港本土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人間思想》，第十期（2015 年夏季號）

的資格也受到挑戰、「少年軍」與禁令橫行，如同文化大革命重來，小孩穿上軍服四出偵查「犯禁」的東西，連賣雞蛋的雜貨店與漫畫店也被查。電影也許過份誇張渲染香港未來的社會環境，但電影在香港大受歡迎，正是反映本地觀眾對香港未來的憂慮與共鳴。去年世界杯外圍賽中國隊對香港隊的賽事中，香港球迷在球場高舉「香港不是中國」的標語，並對國歌發出噓聲。對於中國強烈抗拒的情感，都在各日常生活的文化場域中展現出來。

從教學語言上「普教中」的爭議，到在日常生活上對普通話、簡體字情感上的厭惡，都是在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對香港本土衝擊下的一種自我防衛。然而，所謂「中國因素」對本土面貌的改變，卻不只是中國上而下的文化霸權計劃，同時亦是香港本地各種不同的力量，都樂於參與其中。正如上述「普教中」與「自由行」的例子：學校在資源的誘因下，都積極參與「普教中」的計劃；家長對於「三文兩語」的菁英想像，認定學好普通話能使孩子擁更多的文化資本，更具競爭力，都樂於把孩子送到「普教中」的學校；在中國大陸遊客的經濟誘因下，香港的旅遊與零售產業都配合中國大陸遊客的消費模式，*agnès b. Café* 的餐牌上只有英文和簡體中文，更是餐廳以中國大陸遊客作為顧客社群的想像。

結語

不管是語言的實用主義想像、或是廣東話作為中港區隔的象徵，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的發展，並非因應教學上的需要發展，在不同的時期，都有政治目標的考慮，也受社會上多種不同力量影響。然而，從殖民時期到當代的教學語言政策，都仍受殖民政策的思維模式影響。強調教學語言的功能性，打造能操「兩文三語」的文化菁英，與殖民政府培育「英語菁英」，透過與一少部份「高等華人」共謀，方便殖民者治理的策略如出一轍。廣東話作為中港區隔的象徵，這種對於本土文化的自我保護，卻是非常封閉的，一方面忽略了香港長期以來的殖民性格，中國對香港多方面的影響，不完全是北京政府上而下的全面干預，更多是香港商家的共謀所至。另一方面，廣東話作為中港區隔的想像，卻是在不經意的情況下，更加鞏固英語在香港概有的文化霸權位置。諷刺的是，「三文兩語」的文化霸權爭奪，在講求競爭與族群政治的氣氛下，學生既憂慮難以向上攀爬，又對於適應普通話感到情感上的厭惡。在現今過分不安鬱躁的香港社會，對於教學語言政策的想像，是否有超越族群或是功能主義的另一種思考？是否有另一種更進步的政治想像？文化霸權的爭奪是不斷持續的過程，回顧從殖民到當代香港教學語言政策，本文嘗試透過梳理教學語言當中的政治性，並從不同力量角力的隙縫中，試圖尋找另類政治想像的可能。

參考資料

- 中大五十年編輯委員會(2015),《中大五十年》,香港:中大五十年編輯委員會
- 王賡武編(1997),《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局
- 許寶強(2015),《缺學無思: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許寶強(2015),〈香港本土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人間思想》,第十期(2015年夏季號)
- 黃庭康(2008),《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台北:群學出版社
- 黃庭康(2015),〈無心插柳的霸權效應:戰後香港中文學校的組織吸納〉,《思想香港》,第6期,2015年3月,(<http://www.thinkinghk.org/#!v601-/c1bpk>)
-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Elaine Chan (2002), *Beyond Pedagogy: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23, No. 2 (Jun.,2002), pp.271-285